

# “约谈”引争议,效果待观察

党校学者认为,价格干预只要不过分就可接受,建立合理涨价机制是根本

这几个月来,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密集“约谈”协会、企业。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是2007年颁布实施《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次。“约谈”这种方式,也引起了社会的争议。它既不是传统的行政命令,又存在着行政干预的嫌疑。

## “约谈”真的管用吗

发改委“约谈”企业稳定物价,此举一出即遭诟病。对此,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4月19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进行了回应。该负责人表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一贯充分尊重企业定价自主权,坚持依法行政。

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企业的一个主要缘由是,3月份以来,陆续有日化、方便面、酒类等企业,在媒体上发布涨价信息,推升了市场的涨价预期。个别地方出现了居民的小规模抢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

这位负责人说,“约谈”这种方式,是一种通过提前介入进行提醒、告诫的相对温和的措施,是一种沟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预,更谈不上干涉企业定价自主权。

“约谈”效果立竿见影。宝洁、联合利华、康师傅等企业在受到约谈告诫后,纷纷搁置了涨价计划。联合利华就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暂缓调价的决定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而作出的。

对于“约谈”的效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平认为:“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的观察。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很多企业确实存在着成本上涨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4%。

康师傅公司发布的公告表示,面粉、棕榈油等各项原料价格持续上升,对利润产生压力,是调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发改委的多种价格调控行动下,一些企业一肚子苦水。

## 非长久之计

陈平教授说:“一些大的连锁公司,垄断性企业的涨价行为,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市场冲击。相互串通的涨价行为,更应该是被制止。但是,由于成本的压力涨价,仅仅通过‘约谈’是不可能抑制的。”

事实上,在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的背后,是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去年12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中国财政》杂志刊登的《开创“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工作新局面》一文中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能面临持续较大的通胀压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14.88%,但行业利润下降

了5.99%,企业亏损面达到15.35%,亏损额比上年增长了49.39%。尤其是本土日化企业洗涤类产品的平均毛利率是7%,净利率仅有3%。

中央财经大学外汇储备研究中心主任李杰说,价格管制通常无法对单一产业进行,而是“联动”的。如果只对粮油限价而不对原材料限价,压榨企业肯定是要亏本的,停产就是理性选择。厂家因为保本或保利,在停产了之后,市场供应减少,价格更高,会给价格调控增加更大难度。 中国经济周刊

## 观点PK

### “约谈”方式好不好?

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盛杰民:约谈确实只是一种沟通方式,并不能认定为行政干预,不具有强制性,“这种方式我认为挺好。”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约谈行为本身是不合理的,虽然声称是一种沟通方式,但企业怕“穿小鞋”,约谈后没有企业敢不尊重发改委的意见,“发改委如果想了解物价情况,可以到市场调查,企业没有犯错,凭什么约谈人家。” 新京报

## 对话

就相关话题,快报记者采访了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月平。

现代快报:对于“约谈”,现在存有争议,有的认为约谈确实只是一种沟通方式,并不能认定为行政干预。有的则认为约谈行为本身是不合理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月平:约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形式,就是有关部门就价格问题,向企业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发改委作为市场价格的主管部门进行这样的约谈,也是说得通的。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中国的物价上涨问题也非常复杂,有市场原因,也有非市场原因,有的是理性的,有的则是非理性的。物价上涨,对老百姓来说,肯定存在不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只能就一个现象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这样的意见往往又是带有情绪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因为掌握信息比较多,就可以高瞻远瞩,通过一些宏观的货币政策和各种经济手段干预一下市场,来控制物价,控制通货膨胀,现在我国有一个说法就叫“管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呢,针对某些企业非理性的涨价行为进行一下行政干预,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现代快报:也就是说,这种“约谈”是一种行政干预?

孙月平: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干预形式。只要不过分,只要不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整个

市场的供给,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不破坏市场规则,就可以接受。而且我认为,这种“干预”只是一种指导,并不具有强制性。不过,对企业来说,这种指导还是有一定影响和力度的。在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里,它除了货币政策供给、市场供给,同时也有窗口指导。

现代快报:宝洁、联合利华、康师傅等企业在受到约谈告诫后,纷纷搁置了涨价计划。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担忧,在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预期等多重压力下,涨价可能会成为最终选择。而“约谈”也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

孙月平:我觉得“权宜之计”的说法是说得通的,它只是眼前控制物价的组合拳里的一种手段,且是短期的工具。它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求企业涨价要理性,不能跟风涨,不能乱涨,而且即使你有理由涨,也要放一放。比如,市场中的竞争关系、供求关系都可以决定价格,政府不能决定市场价格,但是可以去影响市场价格。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靠市场手段、市场规律来起作用。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要理顺价格关系,建立一种合理的涨价机制。而建立这种机制,也需要政府的指导。即使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反对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所以,不能看见政府干预市场就跳起来反对。 快报记者 刘方志

## 今日视点

# 谁说“没有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安全”

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违法添加剂最近频频惹祸。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也引发了中央的高度关注,4月2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表示将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并对非法食品添加剂开展全面布控。今年年底前,卫生部还将公布食品复配添加剂通用安全标准。这些都证明,食品添加剂的确是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在,却有人说“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安全”,真是怪了!

说这番话的人来头不小,他叫孙宝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孙院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时候力图为食品添加剂正名,用他的话说,人们把违法添加物和食品添加剂搞混了,食品添加剂成了食品安全

事故的替罪羊。孙院士还说,“几乎所有食品中都含有食品添加剂”,所以他认为,食品添加剂不但对身体没有坏处,反而是确保食品安全的物质,“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安全”。孙院士举的例子是:酱油里加了防腐剂,就不会长毛长虫,这就确保了酱油的食品安全。

首先要说一点,妖魔化食品添加剂肯定不对,并不是所有的食品添加剂都有原罪。现在出问题的,主要是那些违法添加的物质。但这并不能说明孙院士的理论就是对的——什么叫“没有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安全”呢?如果孙院士的理论是成立的,那也就是说食品添加剂领域是没什么问题的,那么这又该怎么解释卫生部要出台食品添加剂通用安全标准呢?又该怎么解释我国重新规定了三聚氰胺在乳制品里的最高限制呢?由此可

见,有添加剂并非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对使用添加剂实行严格的标准化更管理更重要。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虽然多为非法添加剂所致,却也暴露出了我国食品添加剂领域安全标准不严等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食品添加剂现在需要的不是正名,是更严格甚至严苛的安全标准和问责制度。如此,才能确保食品添加剂在“最低程度影响人体”的条件下依法使用。

再来说另一个问题——食品添加剂是要最广泛添加还是能不添加就不添加?面粉增白剂从5月1日起已经禁用了,记得当初卫生部为这个至今无法证明“无害”的添加剂设立一年过渡期时,就引发了舆论的普遍质疑——既然不能证明其安全,当然就不该添加,禁得越早越好,干吗还搞个一年的过渡期?好在后来卫生部顺应

民意取消了这个过渡期,在禁用面粉增白剂的公告中,卫生部是这么说的: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的情况下,方可使用。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实在没办法,食品添加剂是应该尽量不用的。这个原则,符合人们“食品添加剂能不用就不用”的判断,却似乎与孙院士“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食品安全”的说法背道而驰。此外,卫生部还在公告中提到,我国消费者普遍要求小麦粉保持其原有的色、香、味和营养成分,追求自然健康,尽量减少化学物质的摄入。我想,尽量减少化学物质摄入的原则和民意,不仅局限在面粉增白剂,应该在整个食品领域都适用,“神化”食品添加剂的孙院士,你说对吗? (本报评论员 赵勇)

## 中国观察之樁樁专栏

# 滥发几千万津补贴“自查自纠”就算了?

时常听说一些地方给公务员发各种补贴,但要求公务员把发的钱退出来,却是头一次听说。据《新京报》5月3日报道,武汉市直行政单位正进行着一场清理公务员津补贴的自查自纠行动。公务员们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补贴,保守估计总额有数千万元。其中一市直机关被查出多发908.87万元,人均应退还金额达7.39万元。

这事说起来真够讽刺的。6年前,有媒体曾报道过武汉实施公务员“阳光收入”制度,统一公务员津补贴发放标准,并称该市是继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之后,又一推行公务员“阳光收入”制度的城市。但现今的这则“负面”报道,正好点到了武汉、广州等地的名字。更何况,此番

清理公务员津补贴的行动,并非地方政府廉洁自律使然,而是中纪委等六部委去年的例行检查发现的。

这滥发津补贴,说起来就是舆论常讲的权力肥大、滥用公款。每每遇到这种情况,老百姓总是想不通,咱们的教育投资、医疗保障等这些民生项目常常缺钱,为什么在社会保障率先健全起来的公务员那边,一些地方政府出手总是那么大方呢?但老实说,我对这滥发津补贴现象毫不吃惊,吃惊的是,武汉居然煞有介事地搞什么清退——这事儿弄到最后,很难说不会再次成为经不住推敲的“姿态”。

我们对银行巧设名目乱收费已经习惯,但其实一些地方给公务员发津补贴的名目,与银行有得一

比。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擅自给公务员发放的津补贴名目多达300多项。想想看,清退几项津补贴或许不难,但权力过大、机制不透明的问题不解决,滥发津补贴必然还会出现,我们对银行的乱收费清理,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更关键的是,现在清退了部分津补贴,如何保证今后不会以其他名目又发回公务员手中呢?如果先清退后归还,那明显就是多此一举嘛!

武汉滥发的津补贴,主要来自预算外资金,这些钱多数是从乱收费乱罚款中来的,前些年,国家不是大张旗鼓地清理过小金库吗?眼下清退公务员津补贴的行动表明,小金库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在权力得不到足够约束,权力创收的土壤

仍在的背景下,许多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整治行动,都注定是昙花一现。这种事儿弄多了,反而有损政府公信力,甚至还浪费了行政成本。

有专业人士提议,对于地方政府滥发津补贴,应当立法约束,同时强化相应的公开透明机制。我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因为针对这类问题,早有法律约束。譬如,违规发钱按贪污公款论处也未尝不可;而公开透明机制,最现成的法规便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见,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别总对政府部门太宽容,如果犯错甚至涉嫌集体腐败只是纠正一下就算了,我想谁都不会把它当回事的。(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热点纵论

# “五道杠”何以变为沉重的舆论枷锁

日前媒体报道了武汉“天才少年”黄艺博,据说他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八岁开始阅读《参考消息》《人民日报》,现已发表100多篇文章,上网只关注民生大事,而不玩游戏。更吸引大家关注的,是一个此前不甚熟悉的词——“五道杠”,还有这位“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队长”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队牌的图片。很多人惊呼,以前以为三道杠就顶天了,直至黄艺博为自己扫了盲。(5月3日《新京报》)

目前家长已回应对,网上信息有误,其实黄艺博只是“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队长”。但它并未平息网上舆论,网上各式PS照片和段子,仍集中在这个孩子的“官相”、文字透出的“官腔”。过度的舆论压力,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就像当初林妙可等小朋友遇到的困扰一样,现在黄艺博的父亲也在呼吁“想早点平息此事,别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儿子的身上”。

这里有个问题要搞清楚,集中在黄艺博身上的舆论纷争,怎么会被视为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呢?或者我们把问题分解一下,舆论主要是盯着黄艺博,还是盯着那个“五道杠”呢?答案不言而喻。

黄艺博和蒋方舟等天才少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崇尚个性和符合天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前者的成长路径,则是违反儿童成长天性的强化发展。即便如此,假如黄艺博只是黄艺博,舆论至多也就是惋惜,但当黄艺博和“五道杠”画等号,舆论的关注强度和表达压力,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就像当初林妙可等小朋友遇到的困扰一样,现在黄艺博的父亲也在呼吁“想早点平息此事,别把对社会的不满发泄在我儿子的身上”。(李晓亮)